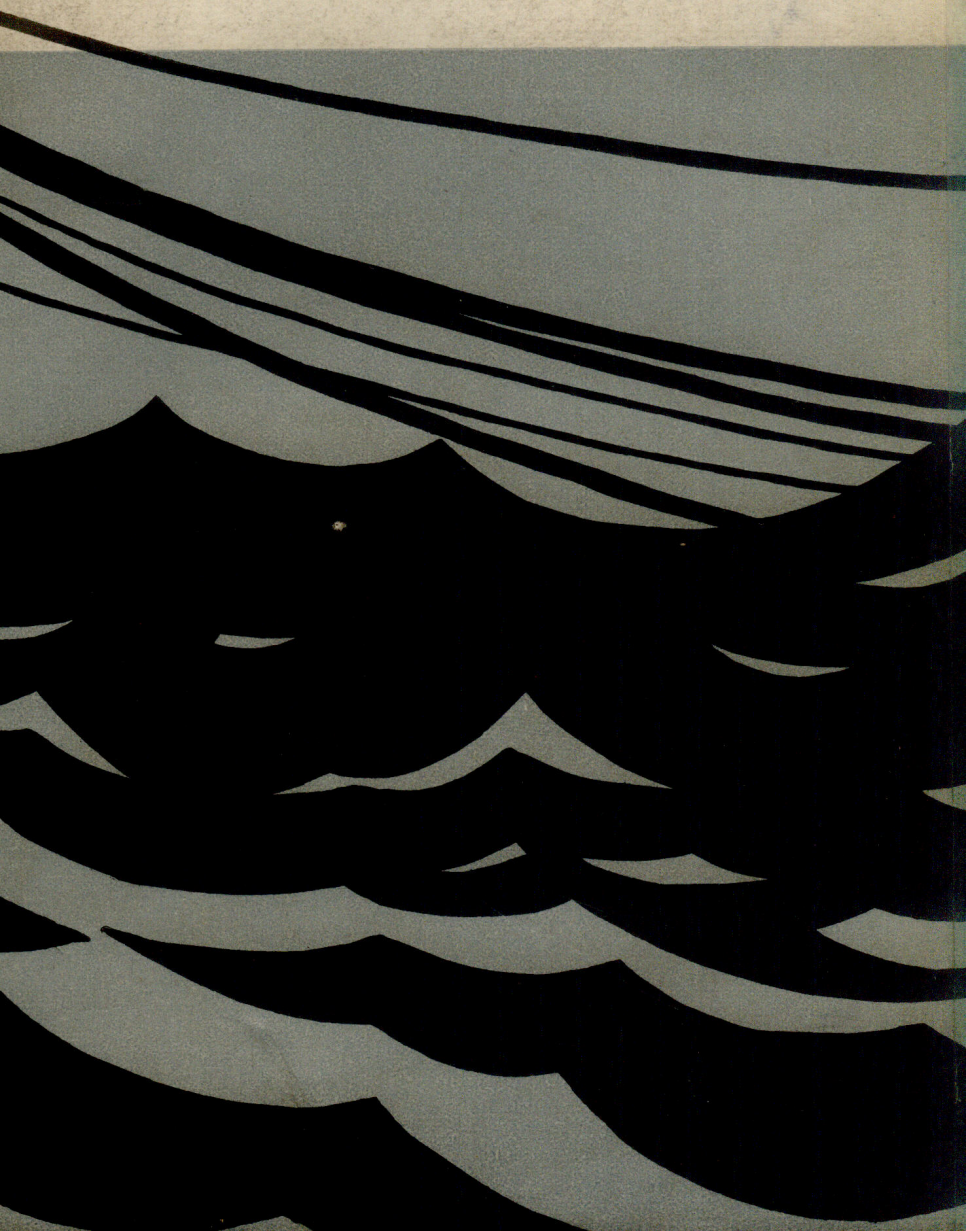


黑潮

德富蘆花著



黑

潮

[日] 德富蘆花 著

金 福 譯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59

本書根据日本改造社“德富蘆花集”1927年版本譯出

黑 潮

原著者 [日] 德富蘆花
翻譯者 金 福

*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康平路155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094号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新华書店上海发行所总經售

*

开本：850×1156 1/32 印张：9 7/8 字数：218,000

1959年8月第1版

1959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4,000

統一書号：10078·0958

定价：(九)1.00元

內 容 提 要

“黑潮”是二十世紀初期日本一部轟動一時的社會問題小說，它揭露了明治維新開頭幾年里所謂上流社會中的丑惡面貌。當時新興的日本資產階級竊取了農民起義的成果，和封建貴族勾結起來奪得了政權，反過來對人民進行着殘酷的迫害。作者通過了東三郎這樣一個人物，表達了他對資產階級政府的憤懣情緒；他在这里描寫了執政的官僚和封建貴族那種仗勢弄權、荒淫無耻的生活，從喜多川伯爵夫人母女兩人的遭遇中，顯示了日本婦女的無權地位和悲慘命運。這部小說中描寫的官僚政客，實際上都是當時日本朝野的實有人物，因此更增強了本書的現實性和諷刺性。

本書在蘇聯已有譯本，俄文版的譯者并寫了一篇長序，對這本書和它的作者作了適當的評價，現在附譯在这里，供讀者參考。

序

〔苏联〕伊·李伏娃^①

一九〇六年六月三十日。这是一个微热的夏日的早晨，在雅斯娜亚·波里雅娜一个古老的花园里，有一个异乎寻常的客人坐在一条长凳上。时间还早，屋子里的人们还没有醒来。周围一片寂静，只有一阵阵微风，吹得树叶发出轻微的沙沙声，池塘里静静的水面，也跟着荡漾着一阵阵涟漪。这位从国外来的客人就坐在池塘边上。他身材不太高，眼睛略略向上，脸色带些黝黑。他坐在那里一动不动；也许，由于即将与伟大的托尔斯泰见面，即将听到他久已热烈敬仰的有力的声音，因而使他堕入了冥想之中；再不然，由于旅途的劳顿，他已堕入了睡乡。突然，有一个声音把他从沉思中唤醒了：

“是德富先生吗？”说话的人对这位来客的姓，在发音上还有些别扭。

客人抬起头来，只见面前站着一位白胡须的老人，他穿着一件宽大的衬衫，腰里束了一根皮带，眯细的眼睛发着光，显露着亲切的笑容。他一只手搭在腰带上，另一只手伸给了客人。客人感到他的手又大又热。

日本作家德富健次郎就这样第一次会见了伟大的俄罗斯作家列夫·托尔斯泰，实现了长久以来所热烈向往的愿望。德富在雅斯娜亚·波里雅娜一共呆了七天。在这些日子里，他们一

起散步、交談、爭論。這兩位，日本人和俄羅斯人，都是使用的外國語言——英語。在托爾斯泰的日記里，不曾提到過德富的訪問，這是不足為奇的，因為在這位俄羅斯天才作家的莊園里，來自全世界各個遙遠角落的各式各樣的訪問者，是從不間斷的。但在德富來說，這一次會見卻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在莊園里作客的短短一星期中和托爾斯泰的直接交談，在這位日本作家的心靈上留下了深刻的痕跡。使他不辭長途跋涉，來到托爾斯泰身邊的，是他長時期來所思考、所懷疑的問題，是他對真理的痛苦探索和對正義的熱烈嚮往。

作家德富健次郎（筆名蘆花）是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日本文學界最卓越的代表。他的創作——長篇和中篇小說、評論、隨筆——在當時的一般文學作品中顯著地占着突出的地位，而表現在那些作品里的現實主義和批判的傾向，更使他的許多著作列入了新時代日本文學最優秀的成就之列。

德富健次郎的一生、他對資本主義陰森森的現實的嚴厲否定、他對真理的不斷追求以及他的作品揭露性、情感的奔放、他那種失望和新的願望——所有這一切，都使他不同於當時日本的文學家，並形成了這位天才作家的創作的無可重複的獨特的風格。

德富健次郎出身於日本南部九州島一個不太富有的貴族地

① 伊·李伏娃是“黑潮”的俄文譯者，這篇序是她為俄譯本寫的（蘇聯“國家文學藝術出版社”莫斯科1957年版）。

主家庭，他誕生的那一年——一八六八年，也正就是日本經過了資產階級革命，從多少世紀以來的封建制度國家進入了歷史發展的新的時代——資本主義時代的一年。這位作家出生的年份和資本主義日本誕生的年份正好符合，這種巧合也帶有象征性。德富的幼年和青年時期，正是日本資產階級第一次當權和封建貴族地主共同支配日本國家命運的時期。正和七十——八十年代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中最進步的代表那樣，德富也醉心於自由平等的思想，嚮往於成立國會和制訂憲法，確信“在君主立憲範圍內的自由與正義的王國”很快就會成立。後來，他痛苦地眼看資產階級日本的專橫無道，感到自己年輕時候的夢想已經成為泡影，因而對上層統治集團的完全拋棄革命思想，憤慨地加以責備。

作者的幼年是在父親的家里度過的。那是在九州島上的一個鄉村里，四周風景如畫，具有亞熱帶的情調。綠油油的稻田，四周圍繞着連綿不斷的群山，一簇簇濃密的竹林子，以及那清澄、湍急、低鳴着的山溪所構成的這幅平靜的畫圖，在孩子的心靈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直到他生命最後的日子為止，德富的心里始終對自己的鄉土燃燒着深厚的、熱烈的愛情。在後來的創作中，他一直以自己那種豐富的靈感和動人的抒情筆調，描繪出故鄉這些美麗的自然景色和日本農民的和平勞動。

作家的父親是當時有知識的進步人士之一，他熱烈地關心當時日本正在進行的變革。他支持一切改革，並對十九世紀七十年代末以至整個八十年代在日本知識分子中展開的“自由民權運動”抱着同情的態度。在“為自由、平等而鬥爭，為普遍的選舉權而鬥爭，為立憲政體而鬥爭”這些口號之下進行的“自由民權運動”，實際上意味着資產階級為進一步取得政權而進行的鬥

爭；因為在一八六八年明治維新以后的最初年月里，政權仍舊掌握在封建貴族和貴族手里。

為了趕上先進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日本的資產階級想從歐洲、尤其是從英國這個典型的資產階級代議制國家中，尋找自己的模範。加速召開國會——這便是自由主義資產階級的“自由民權運動”的主要目標。可是，儘管這個運動整個說來具有着資產階級的局限性，但作為這一運動最急進的核心的許多活動家，實際上却是進步的，是忠實於自由的理想人物。這些人在德富的家庭里獲得了熱烈的同情。這位未來作家在他的年青時期里，不止一次地在家里傾听着父親和那些志同道合的來訪者之間的談話。這種談話往往進行到深夜，談話的中心都是對政府的嚴厲批評和對“自由民權運動”的最激進、最積極的活動家們的熱烈贊揚。這些談話在這位少年的心靈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激動了他的思潮，使得他更注意地去觀察周圍的生活。

這位少年在大學求學時，更堅定了對於自由的美好的理想，雖然這種理想在很大程度上還是模糊的。他的父親希望把自己的兒子教育成為新的資產階級社會的真正成員，因此把健次郎和他的哥哥一起送到新式的大學去讀書。這種按照歐洲方式辦起來的大學，最先出現在九州熊本，後來又出現在日本的古都京都。在當時的日本，這種學校已經有很多了；學校里的一切，從所講授的各種學科（其中主要的通常是英語、法律、經濟和歷史）起，直到體育以及伙食為止，都搬用了歐洲的一套方式。它們的興起，正是要給日本的新政府教育出一批思想和政治幹部。這一類學校常常是由歐洲人主持的，其中很多是傳教士。他們為了使學生接受歐洲的文化，不僅教他們怎樣使用刀叉餐具，同時也灌輸給他們基督教的教義。德富健次郎受教育的也是這種學校。

在这种新的学校里，德富处处感到不习惯。教员都是陌生的，英文从未学过，体育课也使他感到劳累和不习惯，尤其是肉食更使他感到恶心——德富在家乡的时候，不但自己没有吃过肉，而且从来也没有看到过任何人吃肉。可是，不久以后，他就对学校习惯和喜爱起来了。在“同志社”^①学校里，自由的精神高于一切，在教员中间，“自由民权运动”的思想也占着统治的地位。这些都吸引住了德富。

“一听到‘自由’这个字，我们的心就会突突地跳起来，”许多年后他在那本描写求学时代的自传体小说“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我们的眼光在‘伟人’上发着光，我们的胸膛里不断地沸腾着‘纯洁的愿望’；我们的一只眼睛在看着书本，另一只眼睛却注视着这世界；我们卷起了袖子，从学校的窗子里注视着社会，我们的心境仿佛是军事学校中的大兵正在等待着走上战场的信号。”

就在这种状况之下，德富健次郎的思想渐渐成熟起来。对周围的一切都抱着青年人的热情和敏感的态度，在十八岁那年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礼；他热烈而又真诚地对待这种在日本新出现的宗教，就象对待一切使他激动的事物一样。德富健次郎在一八八九年他二十一岁时，告别了学校，到了东京，在这陌生的京城里开始了新的生活；他做过采访员、新闻记者，最后成了作家。

德富成了进步出版社的工作人员，这家出版社叫做“民友社”，这种称呼在当时是有代表性的。出版社的主持人就是他的大哥德富苏峰，他也是一个新闻工作者和政论家，当时已经在日

① 同志社，这是一个对当时的时代具有代表性的名词。——原注

本社会上占有相当高的地位，健次郎就在这里开始了新聞工作者的生涯。

开始时他只是做些很平常的工作——写些短評，看看原稿以及处理一些日常工作。后来，有一些复杂得多的任务也交給这位年青的記者做了。为了满足广大讀者群众的需要，“民友社”出版了一套專門性的丛书，它們的目的是把十九世紀最杰出的人物的生平和活动介紹給日本讀者。这一套丛书里包括了很多偉大的作家、学者以及軍事和政治活动家的傳記，而其中有不少是交給德富执笔編写的，这里面有一本便是叙述列夫·托尔斯泰的創作与生活的。德富以青年人旺盛的精力完成了这一工作。一八九〇年这本书出版了，書名是“俄罗斯文学泰斗托尔斯泰”。

在写作过程中，德富詳尽地知道了这位天才作家的生平和創作，这对于他的人生觀以及創作的进一步的形成起了极大的、而且可以毫不夸張地說，也是决定性的作用。德富一生热烈崇拜列夫·托尔斯泰，学习他真实地描写现实的艺术。托尔斯泰的高度的人道主义、对暴力的憎恨、对邪恶的否定、甚至连那克服这种邪恶的幻想的道路都使德富深为佩服。德富无条件地接受了托尔斯泰的一切，包括他的錯誤在內。直到三十年之后，即一九一八年时，他才在自己的一本小说“新春”中写道：

“我抛弃了托尔斯泰。这对我來說，就等于抛弃了生养我的父亲。抛弃父亲，抛弃托尔斯泰，对我來說，也就是意味着抛弃我自己……”

在这段时期里，德富繼續着新聞工作者的活动。在东京生活的十年之中，他通过“民友社”发表了很多論文、随笔以及著名的政治活动家的傳記。他在“西欧各国历史片断”和“世界各国名妇鉴”等書（这是些在日本的条件下进行資產階級道德思想宣

傳的新的普及讀物)中,給日本的讀者介紹了对个人权利、对自由以及对社会生活的新的观点;他是根据資產階級世界觀对这些問題进行不断的考察的,他認為它們如果与古老的封建基础比較起来,显然已大大地前进了一步。

德富虽然显得是一个有才干的新聞工作者,但他真正的才能却并不在这方面。事实上,德富发现自己的才干是在文艺創作方面。到十九世紀末,也就是一八九九年,他的第一部小說“不如归”就問世了。

在这部小說里,他按照日本民族的生活和习惯的独特的情況,提出了日本妇女的无权地位,她們的人的尊严,以及她們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等等問題。他指出在資本主义的日本仍旧存在着那种畸形的、腐朽的道德基础,并试图从进步的、人道主义的立場来解决这些問題。由于德富所描写的不是偶然的而是典型的悲剧,因此他所提出的就不单是日本家庭中的不公正的問題,而且也是整个社会制度的不合理の問題。早在第一部小說里,德富就以所謂上流社会作为背景来展开小說主人公的悲剧,这决不是偶然的。正如他精神上的导师托尔斯泰一样,德富也看到了統治階級的这种危害人类的自由和幸福的罪恶。冷酷、无情和伪善的上流社会乃是使“不如归”的主人公在和当时的社会制度进行力量悬殊的斗争中遭到悲剧性毁灭的主要罪人。

小說“不如归”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重版了許多次;而且,这几乎是日本第一部被翻譯成包括俄文在内的許多欧洲文字的小說。自从这部小說出版以后,德富正如拜倫所說的那样:“一朝醒来——我已經成为有名的人了!”

从此以后,德富开始了緊張的創作活动。他的新書一本跟着一本出版。一九〇一年出版了“自然与人生”,这是一本描写

自然与生活的丰富多彩得出奇的文集，有时是靜靜的冥想，有时却充滿了憤怒和指摘。一九〇二年又出版了他那本自傳小說“回忆录”。

一九〇三年，德富又出版了一部新的長篇小說“黑潮”。这部巨著描繪了在資本主义日本“自由、平等、友爱”理想的幻灭。在德富所有的創作中——不論是“黑潮”以前或以后的，从来也沒有象在这一本中那样表现出如此强烈的公民的激情、如此激动而痛苦地揭露他那时代的现实。这部小說是作者在創作出这部小說之前的若干年間思想意識痛苦地演进的結果，这种演进的意义就在于作者对过去所向往的理想感到失望了。

到了一九〇三年，已經再也沒有幻想的余地了。日本資本主义的发展已經走得太远了。如果想仍然盲目相信資產階級会“恩賜”民主，那就必須放弃人格和良心，可是德富却是异常珍惜这种品质的。

一八九四到一八九五年的中日战争以后，日本国内的一切情况，都說明了資本主义日本已經走上了侵略战争和殖民掠夺的道路。过去的、暫时的日本資產階級自由，現在連一点儿痕迹也沒有了。“自由民权运动”成了过去的傳說，不滿者的时代已經一去而不复返了。現在，忠君的日本資產階級已經認清封建官僚政府是自己最可靠的同盟者，它的軍事潜力可以保證資產階級滿足对殖民利益的渴望；而在国内建立警察制度，更可以保證自己的利益不受来自新兴的无產階級方面的危害。

德富具有銳利的目光。他看到了日本資產階級政府的剝削本質，看到了广大人民的貧困和无权地位，看到了陆海軍的不断加强和漫无止境的軍备竞赛。社会制度的問題早已使他感到痛苦。早在一九〇一年，他就曾在“自然与人生”这本文集中描写

了那种資本主义城市的对照，他看到了这样一些默默地消失在人群中的人物：手里抱着孩子的貧困的妇女，衣衫襤褸、眼睛里流露出飢餓的光的苦力……

作者在他那篇标题“国家与个人”的札記中曾这样忧虑地写道：“爱国、忠君、可以一任君說。但愿勿使陛下之赤子瀕于餓殍！”

托尔斯泰对不平和罪恶的揭发，正是德富偉大的榜样，托尔斯泰的作品始終深深地吸引着他。德富从托尔斯泰那里学到了如何观察那种不是偶然的、不是沒有意义的现实現象，学到了如何表現最为重要的問題——人民群众所遭受到的痛苦和压迫的問題。托尔斯泰开闊了德富的眼界，使他看到了一个作家在社会上应負的崇高使命。德富在“黑潮”一書的“跋”中說：

“我为什么要写書？因为作为人类的一員，我想接近一些——哪怕只是一些——全人类团結一致の偉大的理想世界。”

在托尔斯泰多方面的才干中，还有一方面也特別吸引着德富，那就是对資本主义和資本主义文明的否定。德富在年輕时虽曾热烈地欢迎資本主义日本的誕生，但現在，他却以不可抑制的心情对过去所崇拜过的一切全盘加以否定了。資本主义城市和它們大大小小的工厂，在他看来，集中地表現了这一制度的罪恶与缺陷，它們是誘使不幸的农民离开自己土地的陷阱。德富在他一篇題名为“耕作”的后期作品中，預言了貧困、荒淫的現代都市必将毁灭，并指出农民和农业劳动者的“純洁的心”必将获得胜利。

德富的内心痛苦，終于使他跳出資产階級新聞工作者的圈子，脱离“民友社”，甚至終于和他那位主持“民友社”的哥哥苏峰完全脱离关系。这一冲突的基本原因是在于作者和他这位长兄

之間在思想上有了深刻的分歧。苏峰过去虽也曾支持过进步的观点，但后来却公开倒向反动的陣营中去了。德富退出“民友社”时写給他哥哥的一封长信，后来就附在小說“黑潮”的前面作为該書的“代序”。这封信是严格地遵照东方的古代文体写的，即使講的是不愉快的真象，但在信內提到对方时，还是使用了非常尊重的語气，而提及本人时則正巧相反，都使用了自卑和謙虛的詞句。这封信充分表现了德富的宇宙觀的变化。

他在开头几句中对这位兄长的聪明与才干进行了一番恭維之后，接下去写道：“弟本应追随兄长，以至天涯海角而勿辞；而今遽欲告別，并至脱离栖息已达十有四年之‘民友社’者……何为而然也？”

“其故无他，盖长久以来，弟已发现我等之志趣已漸背道而馳；其相距之远，实犹先天稟賦之生来即有所不同也。弟因此而忧悶于心者久矣。盖深知如以姑息之情自欺欺人，决非保全皇天賦命之計，更非报答兄长恩义之道也。夫人之命运，早在母胎即已决定。松子发而为松树，櫟子終亦不得不长为櫟树。主义也，同情也，要而言之，盖皆各自发展之現象而已。是以强健如兄者必然同情强力，孱弱如弟者必然同情弱者矣。兄性格复杂，故处世不辞委婉曲折，而弟性单纯，故偏好耿直。兄既为經世家，凡事当亦以功利为主；折衷讓步，此乃成功之秘訣；目之所視，不离功利，在兄长目中，所謂文学者，亦維經世之一种手段而已。反之，置身于思想界者，当有所不屈之骨气，弟既已献身文学，自必高唱文学之独立，因而不能不彷徨于由美而达于真善之境地。即以經世之手段而言，兄重視国力之膨脹，走帝国主义之道路；而弟則愿承雨果、托尔斯泰、左拉諸先生之教誨，执人道主义之大义，因循自己之社会主义。弟决不敢以此非兄，或以此是

己。盖真理之山，其峰多矣，兄立于彼，而弟立于此耳……”

值得指出的是，德富始終堅持自己的決心，在任何方面都不和那位兄長合流，並堅決拒絕任何調解或者和好的企圖，因而至死也沒有和那位哥哥再見一面。而那位有名的新聞工作者、德高望重的歷史教授、受到資產階級政府特別寵愛的德富蘇峰，也只是在這位作家逝世之後才重新見到他，那時候，德富蘆花已經躺在靈床上了。

總之，他“自己的社會主義”萬歲！他希望向偉大的導師——雨果、托爾斯泰、左拉學習人道主義的偉大精神。那時候，這三人中已有兩個不在人世了，德富因而對那第三位——托爾斯泰寄予着熱烈的、不可抑制的期望。他以為在雅斯娜亞·波里雅娜，那些一直使他痛苦的問題將終於得到答案，一切疑問將終於獲得解決。

一九〇四到一九〇五年日俄戰爭的開始，使德富這種企圖未能立即實現。可是，當大炮才一停止轟擊，他就動身了。德富在訪問托爾斯泰的途中還路過了巴勒斯坦，到基督教的發源地——貝茲蘭姆、拿撒勒、耶路撒冷……等地進行了訪問。

終於，他來到了雅斯娜亞·波里雅娜，和托爾斯泰在一起度過了短短的但是永遠不能忘懷的一個星期。他曾在“巡禮紀行”一書中詳細地敘述了當時的情形：廣大而喧鬧的家庭，大大小小的孩子、外孫以及許許多多的親戚……就在這些人中間，他——這位偉大和明智的老人、殷勤的主人，親切地招待着來自遙遠的日本的、從未謀面的客人。

這些日子的印象永遠鐫刻在德富健次郎的記憶中。

七年之後，當他震驚地得知托爾斯泰逝世的消息時，曾寫信給索菲亞·安特萊也芙娜·托爾斯泰（德富稱她為雅斯娜亞·

波里雅娜的寡妇)說：“啊，那張放在楓樹下面的、鋪着雪白的枱布的桌子！啊，那張每天早晨安放冒着熱氣的茶炊等着我們去喝茶的桌子，在它腳下的那些沙土又是這樣的白皚和柔軟！啊，那些在陽台上度過的傍晚，先生在念着書，而您則坐在縫紉機前工作着！啊，那個在外廊上度過的夜晚，听着您家年輕人彈着曼陀林和唱着歌！啊，那次在伏龍克河里的游泳！那幾次在白樺樹小林子里的散步，陽光穿透了樹葉，洒得遍地都是點點黃金色的花斑！”

德富在離開日本的時候，原來是打算環游世界一周的。他還希望訪問意大利、法國、英國，然後經過美國——也就是他自己所說的要通過“美國錢袋”回國。可是，他現在卻改變了計劃。快些回家！快些行動！他知道，應該有所作為！因此他也不再去訪問西歐，而是通過西伯利亞急急忙忙回到了祖國。

德富在一九〇六年八月回到日本。第二年春天，他便賣掉了城里的房屋和財產，在離東京不遠的千歲村粕谷买下了一小塊地和幾間簡陋的草屋。他希望今後要象農民那樣“以自己雙手的勞動”來“依靠土地”生活。

德富的行動引起了很大的反應（當時他在文學界已經有很大的名聲了）。新聞記者都到千歲村去訪問他，每個人都想看看這位丟掉筆杆拿起鋤頭的著名作家。

但德富對自己“回到土地”的態度卻是非常認真的。他勤懇地在地里工作着，而且还從這裡收穫了三袋燕麥，換到了六圓錢的收入。

一九一三年出版的“蚯蚓的獨白”便是他這幾年鄉居生活的總結，它非常清楚地表達了這几年中激動着他的思想和感情。德富在這本書的一章——“耕作”中寫道：

“耕作——这是人类生活的起始和終結。

“从人类在尼罗河和幼发拉底河畔使用木头来垦植土地、最初种出野生植物的原始时代开始，到现代美国那样使用最复杂的机械的农业经营为止，世界上已经发生了令人目眩的变化。可是，土地却依然还是同一块土地；历史就象一阵旋风，在这片土地和人类的幼芽上席卷而过。耕作的生活就是土地的生活，而土地是不灭的！尽管拿破侖、威廉、賽西尔·罗得斯怎样建立他們的統治；尽管洛希尔家族、摩根集团怎样积聚他們的財富；尽管齐伯林、霍兰德怎样学着鳥飞魚游；尽管柏格森、密奇尼科夫、赫克尔怎样深思善辯，蕭伯納和霍普特曼怎样尽情地笑和哭，戈根和罗丹怎样地善于繪画和雕塑……农民的大多数还是和过去一样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飲，耕田而食。’今天，那些土地上聳立的是倫敦、巴黎、柏林、紐約和东京；有一天这里还是要成为狐兔钻土凿穴的地方。但是，当世界接近它的末日时，在已经变成为肥沃的平原的撒哈拉，农民們的鋤头将在夕阳下閃着光芒。”

这一篇动人的对农民的頌贊，真实地說明了作者的心意。德富带着受难者的灵魂热情地、无条件地信奉着他自己的“宗教”。可怜的是，生活本身消灭了他的希望和幻想！

德富想把自己变成农民的一切空想遭到了惨重的失敗。不錯，他没有离开千岁村，但是他放弃了农业劳动，又恢复了写作生活。經過了这一次最可怕的失望，德富懂得了自己是如此可笑，竟想給人类指点这样一条道路：只要在田圃里鋤掉紅蘿卜畦上的杂草就能获得拯救。也就是在那本“蚯蚓的独白”中，他怀着內心的痛苦把自己称作“伪农民”、“假装的乡下人”、“农民唯美主义者”。由于对托尔斯泰的学說缺乏深刻的理解，也就招来